

### 姚依林同志早期革命生涯



1981年，姚依林副总理（左）与清华学生座谈

姚依林，曾用名姚克广，1917年9月6日出生于香港。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193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一二·九”运动中曾任北平学联秘书长、党团书记，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第十一和十二届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政治局候补委员、委员，第十三届政治局常委。1994年12月1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

#### 不平静的清华园

姚依林祖籍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梅街镇，祖父辈是个大家族，父辈中几个兄弟都担任过北洋政府的高官。他幼年丧父，随母亲投奔了江苏武进的二伯父。母亲擅长英语，曾在洋学堂任教，思想比较开明，她把孩子们带到上海读书，希望他们学有所成。

姚依林在上海光华大学附中上高中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

变，他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深感不满。在抗日爱国运动的激励及进步同学的影响下，他寻觅探索着，如饥似渴地阅读《资本论》《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一些进步刊物，并与上海青年学生们一起走上街头参加抗日示威游行。

1934年秋天，姚依林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初入清华就遭遇到“拖尸”（英文“TOSS”的译音，清华学生照搬的美国高年级学生欺负入学新生的恶作剧）。新生们对此行为异常气愤，群起反对。姚依林和新入学的同学们团结起来，发表了一个《反TOSS宣言》，在学校里形成了一个“反TOSS”运动。

当年的一年级新生有300多人，由此涌现出一批活动积极分子，从此他们抱成了团儿，例如黄诚、吴承明、杨述、杨学诚等，后来这些人都成了“一二·九”运动的骨干。

清华大学成立了一个世界语学会，号召同学们学习世界语。当时的世界语学会分为两派：一派是绿色世界语，是和平主义者，提出的口号是“用世界语为世界和平而斗争！”姚依林参加的另一派则是以清华大学为主的红色世界语派，是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口号是“用世界语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姚依林在世界语学习班上认识了清华邮局职员王慎之（王经方，共产党员），两人共同创办了名为《北方话新文字》的不定期刊物。他们时常在学校夜里12点熄灯后点燃蜡烛，刻版印刷，一直忙到凌

晨，然后将刊物通过邮局分发出售，由此联系、团结了校外的很多有志之士。

1935年初，清华中国社会科学界联盟组织了一个现代座谈会，请旅欧经苏联回国的冯友兰教授作报告。冯友兰讲了旅欧见闻，并如实介绍了苏联的情况。不料国民党宪兵三团隔日便来清华抓走了冯友兰，说他是共产国际特务。虽然三天之后蒋介石下令释放了冯友兰教授，但冯友兰教授因被关押非常气愤，清华同学们也因此事认识到时局的严峻。

当时国民党宪兵三团异常嚣张，动不动就去清华大学抓人。姚依林很痛心地看着一些高年级同学被抓走，其中大多数是清华校园内中共外围组织的成员。他记得其中一位山西籍同学李一清（共产党员）被抓走，后被释放。宪兵三团的恶行激起同学们的极大愤慨。

50年后，姚依林回忆说：“由于到清华大学以后接连地遇见了几件事，才把我这样一个有民主感情、对共产主义有朦胧认识的青年最终推到了革命阵营中去。”

## 革命生涯的开端

在红色世界语派的活动中，姚依林结识了北平师范大学学生周小舟，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换对时局和社会的看法。后经周小舟介绍，姚依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

一天，周小舟来清华大学找他，给他带来了武卫会的传单《告同胞书》，要他翻印散发。他会刻蜡版，便立即通过在清华学生会中办事的同学取来了印刷工具，将传单很快印好，趁夜间无人时去清华图

书馆张贴。

1935年七八月间，黄河泛滥成灾，灾民流离失所，北平的街头也出现了许多灾民。中共河北省委指示北平党的组织要领导群众开展水灾救济活动。武卫会北平分会负责人周小舟召集彭涛、黄敬（俞启威）、姚依林和女一中学生郭明秋（郭桂英）等人在西山开会，研究为黄河水灾发起救灾活动。会上讨论通过了组织一个公开的群众团体——北平大中学校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曾任女一中校长的孙荪荃同情抗日活动，对此事立即表示支持。8月29日，黄河水灾赈济会在南长街的女一中正式成立，女一中学生吴闰箴为临时主席，姚依林为记录员并担任了秘书长。

黄河水灾赈济会成立之后，很快有20多个学校的学生进步团体参加进来，公开到社会上为救济水灾募捐。姚依林作为秘书长，要组织大家出去募捐，还要管好钱，工作异常繁重。这个阶段，在西郊清华上学的他却经常在城里活动，白天东奔西跑，有时夜晚就借住在女一中或骑河楼的清华同学会旅舍。因旅舍房租昂贵，他和黄敬合租了一间破旧的民房，住了几个月。

从当年8月到10月，赈济会共募集了2000来块银元，大部分捐给了山东赈灾。剩下的几百元，加上“一二·九”游行后不久宋庆龄从上海寄给北平学联的100多块银元，还有清华大学张申府、民国大学潘怀素、中国大学吴承仕等左翼教授捐的200块银元，都成为后来“一二·九”运动的活动经费，用来印传单、出版《学联日报》等刊物。

这年11月初，经周小舟介绍，姚依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 参与组建北平学联和领导 “一二·九”运动

1935年6月至7月，日寇通过签订《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攫取了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11月，日寇又扶植汉奸在通县成立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了冀东22个县。华北面临沦亡的严重威胁。

这时，在黄河水灾赈济会组织下，北平学生在募捐救灾活动中已形成了一支有力的基本队伍。救灾工作结束之后，应当如何把北平学生更好地组织起来？中共北平党组织决定，在黄河水灾赈济会的基础上建立公开合法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11月18日，由十多个学校发起的北平学联在女一中正式成立。当天的会议指定燕京大学学生陈絮（陈矩孙）起草学联宣言，推举郭明秋（女一中）为学联主席，姚依林（清华大学）为秘书长，孙敬文（镜湖中学）为总交通，邹鲁风（东北大学）为总纠察，黄华（燕京大学）为总交际，北平工委宣传部长彭涛担任学联的党团书记。学联机关

设在女一中，学联的刊物或传单则由南池子一个私人的大学出版社承印。

在此期间，中共北平市工委领导人内部在是否可以组织学生向国民党政府公开请愿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认识分歧。彭涛和周小舟、谷景生等人认为，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应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与国民党进行合法斗争，应利用请愿活动等形式宣传抗日。王学明和冷楚等人认为，还是应组织暴动，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北方苏维埃，不同意和平请愿。中共河北省委在听取了两种意见后，决定支持彭涛等人的看法，并决定成立中共北平市临时委员会，谷景生任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李常青为河北省委特派员指导北平临委的工作，后兼任北平临委书记。

北平学联成立后，立即着手酝酿组织抗日救亡活动。12月3日，北平学联在女一中召开各校代表会议，通过了《联络北平市大中学校发起大规模请愿》等两项决议。6日，学联再次召开代表会，通过并发表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就在这一天，传来了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这是国民党当局屈从日寇的野心，任凭华北逐步变成第二个“满洲国”的又一卖国行径！

北平临委得到消息后果断决定发动一次抗日救亡的请愿游行。由于北平党组织不能公开活动，北平学联担负了贯彻这一决定的历史重任。12月7日，北平学联在女一中召开20余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9日组织全市同学向北平国民党当局请愿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



1934年至1935年，清华开展抗日运动的学生代表，  
后排左5为姚依林，前排右2为赵石

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会议研讨了游行口号、时间和路线，并对游行的组织工作进行了部署。

12月8日晚，彭涛、黄敬、姚依林、孙敬文和郭明秋等人又在女一中碰头，检查准备情况，商定游行指挥部设在西单亚北咖啡馆，姚依林和郭明秋在那里指挥，孙敬文担任这次行动的总交通。

“一二·九”游行用的传单，早在12月6日就印好了。8日晚，姚依林找了一辆车到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取传单，把传单运到女一中，又连夜分发下去。各校同学通宵未眠，进行次日示威游行的各项准备工作。红、绿、黄彩纸印刷的传单异常醒目，口号和宣言表达了同学们的心声。游行口号是按照彭涛和学联的意见拟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特殊化！”等，没有提“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保卫苏联”等口号，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姚依林在《一二·九运动回忆》一文中说：“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八一宣言》。当时我们是从《共产国际通讯》《共产国际半月刊》（英文）上看到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的报告《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后，开始知道和认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的。”

12月9日一早，姚依林和郭明秋即去西单亚北咖啡馆二楼“喝茶”。孙敬文、孙荪荃、张申府也去了。不久就听说原定由西直门入城的清华和燕京两校的队伍因军警关闭城门，被阻于城外。指挥部已无法且不必等待与城外学校取得联系，便决定离开咖啡馆，靠近学生队伍。

因清华、燕京两校的队伍和原定的两

校请愿代表未能到达，集中在新华门前的同学们当场推选出中国大学董毓华、东北大学宋黎和北平师大于刚等12名代表临时草拟了请愿书，进入中南海向国民党军委会北平分会的何应钦请愿。学生们在新华门前开大会、示威、呼口号。但何拒不接见学生代表，只派出其秘书敷衍。请愿未成，指挥部决定按计划将请愿转为游行示威，宋黎担任队伍的总指挥。

游行队伍在西单和西四冲破军警的两道封锁线，奔向沙滩、王府井，一路上高呼口号，声势浩荡，而且越走人越多。其中有新加入的辅仁、北大等众多学校的大批学生以及市民。下午3时走到王府井，游行队伍已有数千人。当天北风呼啸天气严寒，姚依林穿着一件老羊皮袄，和指挥部一起，跟随着游行队伍就近指挥。

这一天，指挥部姚依林与郭明秋在西单街头都挨了军警的皮鞭和枪托，但没有暴露身份，也没有影响对游行示威的指挥。

“一二·九”运动喊出了广大爱国学生拯救民族危亡的心声，点燃了他们心中抗日救国的烈火，促使北平各校学生会迅猛发展，爱国学生的队伍空前壮大。同时，因为组织发动这次运动的时间只有两天，许多学校和同学没能参加12月9日的请愿游行。例如，因没有接到通知，请愿之后游行队伍经过沙滩时北大同学才去敲钟集合队伍；东北中山中学未能参加的同学迫切地希望北平学联“再来一次”；清华、燕京等校当天未能进城的1000多名学生心里更是憋着一股劲。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北平学联在市委的领导下，决定再次组织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并多次开会，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1985年，姚依林（前排左1）、何东昌（前排左2）等来校出席“一二·九”运动50周年、“一二·一”运动40周年纪念活动

12月14日，北平报纸登载了国民党当局坚持在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北平学联即将第二次大游行定在16日这天。

12月15日晚，北平学联在王府井南口的长安饭店开会。由姚依林和郭明秋出面开房间，到会的有彭涛、黄敬、孙敬文、董毓华及李常青等人。他们以打扑克作掩护，商量和确定研究次日的行动，检查示威游行的准备情况。此时中共河北省委任命的北平市委书记林枫已抵北平，正和李常青办理交接。

16日上午，学生和市民在天桥聚集了两三万人，天桥市民大会顺利召开。黄敬被拥上一辆电车，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

市民大会当场通过了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等8个决议案之后，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由东北大学的宋黎和邹鲁风担任指挥。游行队伍按原定路线准备从前门进入内城外交大楼（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地点）示威抗议。哪知前门已被军警关闭，游行队伍便在前门外火车站广场举行了第二次市民大会。当晚，宣武门内

外的学生队伍分别受到大批军警的野蛮镇压。当天全市学生共有22人被捕，300多人受伤。反动当局的暴行激起了学生和人民群众的满腔义愤。

“一二·一六”游行示威组织得更好，规模和声势都超过了“一二·九”游行，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卖国行为，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

### 担任北平学联党团书记

12月16日晚，彭涛、黄敬、姚依林、郭明秋、高慧如和李润娥在西单辟才胡同彭涛的家中开会，研究讨论运动怎样深入持久地发展。黄敬提出了“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实际上是反映了他同中共北平市委交换的意见。后来彭涛先走了，剩下的同志继续讨论。黄敬、姚依林还互相摔跤取暖，度过了寒冷的一夜。

“一二·一六”游行之后，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令师大教务长杨立奎通过师大学生会负责人高锦明（敖白枫）和江明（江文彬），请学联负责人在12月18日谈话，谈话方式是由杨立奎出面在西单请客吃饭。北平学联决定由黄敬、姚依林等人去参加会谈，由黄敬出面作答。会上，杨立奎提出要北平学联接受国民党领导，遭到了学联代表的严词拒绝，会谈无果而终。

12月20日，北平市社会局发出训令，强迫各校提前放假。23日蒋介石令各省市专科以上学校派学生代表和校长到南京“聆训”。

为了应对这样的情况，12月下旬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林枫召集北平学联领导骨干开会，决定组织北平、天津各校学生的宣传团，由平津南下，到农村扩大抗日宣

传。北平学联随即开会贯彻市委决策，在燕京大学召开了各校代表会议，决定反对南京“聆训”，开展南下宣传。

南下宣传队整装待发之际，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常青介绍姚依林和市委书记林枫见了面。林枫在谈话中提出，希望北平学联协助解决一个问题：设法联系上居住在上海的鲁迅先生。当时中共河北省委已长时间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希望能通过鲁迅先生恢复与中央的联系。1935年12月31日夜晚，林枫将河北省委写给鲁迅先生的信交给姚依林，姚依林立即找到东北大学认识曹靖华教授的邹鲁风同学与林枫见面。在曹靖华教授的帮助下，邹持信到上海见到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很快就帮助河北省委转交了信件。

1936年1月2日，平津学联组成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彭涛担任宣传团党团书记。宣传团4个分团于1月3日陆续出发。姚依林、郭明秋等留守北平。南下宣传团出发不久，北平市委正式改组了北平学联党团，姚依林任党团书记，黄敬、郭明秋、孙敬文、王其梅为党团成员。南下期间，留守北平的学联党团与宣传团保持着密切联系。

这时，北平学联已经在女一中待不住

了，转移到了汇文中学的一个地窖子里。这个地窖子是汇文中学学生会的会议室，成了姚依林的栖身之所。他还找了清华大学杨述等几个人在这里编起了《学联日报》。南下宣传团出发的十几天内，《学联日报》向各方报道了相关的详细情况。

姚依林和黄敬曾派孙敬文和另一唐姓的同志代表学联慰问宣传团，并带去200元钱。宣传团党团成员江明还曾回北平向姚依林汇报过工作，听说宣传团党团内部对是否在保定收兵有不同意见，姚依林让江了解一下情况，做些工作。

1月下旬，南下宣传团回来后，林枫找姚依林和黄敬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姚依林的住处开会，商定筹建一个抗日的、先进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新的青年组织。随后，彭涛和学联党团成员黄敬、董毓华、姚依林、郭明秋、孙敬文等在西山开会总结南下宣传，决定第一、二团的民族解放先锋队与第三团的中国青年救亡先锋队合并，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6年2月1日，北平民先在北师大成立，之后天津等地也相继建立起民先，民先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壮大，为党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各抗日根据地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干部。

### 三次脱险

1936年2月20日，南京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把抗日救国活动称为“扰乱秩序，鼓煽暴动，危害国家”。从2月21日开始，北平当局对进步学生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行动。

当时北平学联的办公地点已迁至中国大学，中大同学每天有人给学联放哨。一天，放哨的同学突然跑来，向姚依林、黄



在一九八八年四月，刘达校长（右）和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同志在一起

敬和女一中的魏宜娴报告：“快走！警察来了！”他们立即跳墙逃跑。姚依林跑到后海附近亲戚家藏身，恰好碰到母亲来北平找他。母亲非常担心儿子，说想卖掉杭州的房子，用这笔款送儿子到苏联去留学。“我革命在中国，干吗要去苏联！”儿子干脆地回答。最后，母亲终于被儿子说服。自此之后，她不再勉强儿子走她安排的路，而是儿子革命到何方，她都心甘情愿、不辞辛苦地追随到何方。

清华大学因前一个学期提前放寒假未考试，通知学生2月29日返校补考。姚依林就是否回校参加考试的事有些犹豫，便去征求林枫的意见。林枫说，你还是回去考一下，保留一个学籍也好。29日早上，姚依林从城内米市大街坐校车回清华，还带了一本英文版的《共产国际通讯》在校车上看。校车到了西校门口，没想到正赶上大搜捕，一下车就被警察当作嫌犯抓住，关在校警室。接着，警察把蒋南翔、方左英也抓了进来。不久，清华的200多名民先队员们闻讯冲过来，把警察特务赶走了，从校警室将他们3人救出。

当日下午，宋哲元的29军、保安队和警察包围了清华大学，要进校抓人。党支部书记蒋南翔立即召集党员和民先队负责人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布置应对办法。姚依林、黄诚被安排到冯友兰教授家里去躲避。晚上两点钟的光景，军警来冯友兰家查问，被冯友兰应付走了。

5000多军警在学校各处搜查，到所有教授家都去查问过，闹腾了一晚上，“黑名单”上的人却一个也没有抓到，只好胡乱抓走了二十几人回去交差。第二天早上，见军警已撤走，姚依林和黄诚分别离开冯友兰家，就此脱险。

针对反动军警在各校大搜捕的情况，学联党团准备召开一次会议研究对策。3月5日，姚依林和孙敬文一起去党团成员王其梅的住处开会。到后，却发现王其梅和魏宜娴已被特务拘押在住房内。特务对姚、孙进行了一番盘查。

幸而他们应答机智，躲过了一劫。两人离开王其梅住处后，姚依林乘电车赶到盔甲厂的美国记者斯诺家，正好把要去开会的黄敬拦下来了。

为防止国民党逮捕，组织上要姚依林隐蔽一段时间。6月初，党组织调姚依林去天津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自此，他结束了北平的学运生涯，转到另一个战场。18岁的姚依林，从参加武卫会到离开北平，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50年后有人问他革命生涯中最难忘的是哪一段，他深情地回答：“最难忘的还是‘一二·九’运动。”

### 转战天津，参与组织冀东大暴动

到天津后，姚依林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干事，主持编辑中共天津市委机关刊物《世界》，并协助编辑北方局机关刊物《长城》，后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大批平津学生有组织地撤离，多数从天津乘船去山东再转赴各地。作为曾经的北平学联党团书记、此时的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姚依林，为平津学生撤离做了大量工作，并在新形势下重新组建了天津的民先领导机构。在这段时间里，他结识了天津民先总队部委员、中共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支部书记周彬（张淑贞），后来两人结为革命伴侣。

平津沦陷后不久，姚依林调任中共河北省委秘书长、宣传部长。他利用自己大家族在天津的社会关系，在领导华北各界

抗日救国联合会时，积极开展上层工作，取得很大进展。

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中共河北省筹划了冀东大暴动，姚依林参与了冀东暴动的组织和发动工作。在他的提议下，河北省委将华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改组为天津各界武装自卫会，并成立了党团，姚依林为党团成员。

1938年5月，天津武卫会做出冀东大暴动的具体安排，并决定成立华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区，组建冀东抗日联军。为同党

中央接通电信联系，姚依林设法在天津建立秘密电台，使党中央能够及时指导冀津地区的抗日斗争。

1938年7月6日，以滦县港北起义为开端，爆发了20万人参加的冀东大暴动，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为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转自《唤起全民族的抗战——“一二·九”运动人物记》，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沈学明、李炎主编）

## 杨学诚：革命青年的光辉典范

○杨冬明 何吉林（1970届无线电）



杨学诚烈士

杨学诚，1915年8月8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宁岗村。1934年秋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后转哲学系学习。

1935年在清华大学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担任中共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以后又担任过中共北平市委城西书记。

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平津流亡学生南下，9月初到武汉，根据中共长江局指示组建中共武汉地方工作委员会，任中共中央长江局青委委员。组建武汉青年救国团，任青年救国团总团书记。翌年6月，

中共湖北省委成立，任省委委员、省青运部部长。

1938年4月起，历任中共鄂中特委书记、中共豫鄂边区组织部长兼社会部长、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平汉）路西指挥部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五师鄂皖兵团（江南指挥部）政治委员。1942年当选鄂豫边区行政公署副主席。

1944年3月7日病逝于抗日前线的大悟山高家洼，时年29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

### 从寒门学子到热血青年

杨学诚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杨祥和和给地主当长工，母亲黄氏操持家务，养育杨学诚兄妹5人，家境十分贫困。

杨学诚天资聪颖，好学上进。因家贫无钱上学，经常到私塾的窗下偷听先生讲课，用树枝当笔，在地上学着写字。父亲感其诚，卖掉仅有的一点薄地，送他入私